

国资委：加快打造“四新”现代新国企

■本报记者 杜雨萌

6月27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张玉卓应邀出席202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参加“直面挑战：在脆弱的环境中重启增长”分论坛。

张玉卓表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回升向好，企业有活力、增长有动力，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开放合作中

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以自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发展加油助力。下一步，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将进一步推动中央企业聚焦提高效益效率深化改革，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打造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聚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强化原创性引领性技术攻

关，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聚焦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以高质量参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更好融入全球市场，更深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把共同利益的蛋糕越做越大，为经济发展增加确定性、注入稳定性。

论坛期间，张玉卓与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进行了会见会谈，部分中央企业负责人参加了多个分论坛，与中外

嘉宾互动交流，表示企业间合作是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中央企业愿与国际同行企业不断增进理解和互信，在深化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挖掘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为世界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进一步增进了应对全球性挑战脱钩断链行不通、开放合作是出路的共识。

年内地方政府引导基金规模持续扩大 专家建言锚定提升实操能力以增强市场投资信心

■本报记者 田鹏

6月26日，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州市政府出资50亿元设立科技创新母基金，持续发挥母基金的放大效应，引导早投早投科技。同时，200亿元的广州市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金已正式启动。同日，上海浦东新区与海通证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正式启动海通引领区产业引导母基金，经初步估算，未来三年浦东引领区基金下设的三大产业引导母基金有望吸纳撬动约1000亿元的资金关注浦东。

近年来，随着基金招商模式升级和财政补贴股权投资模式的推广，以创投基金、产业基金和专项基金为主要构成的政府引导基金愈发成为各地立足地区产业链，打造循环资金流的有效抓手。

科创中国高丞乡创服务团团长孙文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引导基金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为目的，通过地方政府出资引导，吸引社会资本以形成杠杆效应，进而实现地区内“招商、育商、造商”的效果。

多地更新政府引导基金计划

近年来，各地政府围绕推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纷纷在本土产业链基础上建立创新性招商体系，通过基金等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证券化，实现招商资金的有效进出。目前，已基本形成由锚定培育初期高科技项目的创投基金、聚焦产业赋能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产业基金和专项基金所组成的政府引导基金体系。

据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中国母基金全景报告》显示，2022年新发起成立的母基金共113家，基金规模合计达5473亿元。其中，市场化母基金10家，涉及金额764亿元；政府引导基金103家，涉及金额4709亿元。

今年以来，多地政府引导基金成立步履不停。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年内已有北京、广州、深圳、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大连、西安等地更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计划，涉及相关基金逾26只。

对此，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叶银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一方面是基于当前经济形势，着力扩大投资，通过扩内需来推动短期经济增长；另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年内已有北京、广州、深圳、上海、重庆、武汉、杭州、大连、西安等地更新成立政府引导基金计划，涉及相关基金逾26只



魏健琪/制图

一方面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流向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等重点领域，不断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经济长期增长动能。

从基金类型来看，上述政府引导基金多为聚焦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项目、科技创新领域的产业基金。例如，陕西省政府投资签约的9只引导子基金主要投向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大连市政府将设立大连市政府引导母基金，首期规模100亿元，主要投向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安徽出资500亿元设立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等等。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银行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杨海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产业基金的范围更广，更注重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上的延链补链，其主要目标是打造本地支柱产业；专项基金则是专注于特定领域或主题投资的基金，例如国有企业改革专项基金、乡村振兴专项基金，其主要目标是解决本地区产业发展的难点或重点问题；创

投基金一般专注于成长期高科技企业的投资，其主要目标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虽然政府引导基金有不同类型，但核心职能皆是带动地方GDP、财政收入和就业。”360数字安全集团金融支持部总监唐川补充表示，上述几类基金都有“股债联动”的投资方式，具备了相对灵活性，也是各类基金管理人和企业均愿意接洽的一种投资类型。

提升实操能力畅通退出渠道

在政府引导基金刺激带动市场资金循环的同时，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暴露出因缺乏实操能力，导致大量为资本招商设立的产业基金成为僵尸基金、问题基金，从而加重地方财政负担等问题。

唐川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限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在招聘市场人才方面往往欠缺竞争力和吸引力，很多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人并不具备市场实操能力，这就令基金管理陷于“刻板化”，而对当前的市场机遇、市

场风险把握不当，最终造成相关基金操作失误。

叶银丹补充道，当前政府对基金的约束监管较多、市场化程度不足、基金募资困难、可投标的物缺乏、退出渠道不畅等各类问题，不利于政府引导基金高效服务产业发展、提高投资增速等，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信心尤其是民间投资信心。

在此背景之下，对于政府引导基金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迫在眉睫。唐川建议，短期来看，地方政府需要和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加强合作，充分引入市场经验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长期来看，还是要优化人才选用、人才管理机制，行使市场化职能的岗位更具市场吸引力。

针对市场化程度不足、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叶银丹建议，首先，完善退出配套政策制度，加快审批速度，减少退出成本；其次，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保护产权，促进产权交易，增强股权转让交易信用。同时，发展多层次退出渠道，转变基金退出方式，加快新三板创新层、科创板市场的培育，规范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环境，探索S基金等新型退出方式等。

业界对财政政策发力预期升温

■本报记者 韩昱

6月2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刘昆作了关于2022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报告指出，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六项工作，包括“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重点领域支出保障”等。

随着日前召开的国常会提出“具备条件的政策措施要及时出台、抓紧实施，同时加强政策措施的储备，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综合效应”，最近一段时间，业界对后续财政政策“组合拳”发力预期走强。

广西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是非常必要的。在当前的经济状况下，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增加总量扩张力度，切实扩大内需；同时“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增后劲，提升国民经济发展综合绩效。

“当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确保了一定的财政支出力度，有效发挥了财政支出在稳增长、促就业、保民生方面的重要作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告诉记者，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向内发力”，加大投资、拉动内需，扩大消费将成为今年宏观调控的重点，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点。

那么，财政政策后续还有哪些主要的发力点？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李健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是在专项债拉动投资上发力。地方政府专项债是带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

重要手段，后续可加快现有额度的发行使用进度，甚至可能盘活专项债务结存限额。

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7日，年内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已达到21881亿元，占全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3.8万亿元)的57.5%。李健杰预计，今年7月份、8月份专项债发行或将提速。

其次，李健杰表示，可发挥“准财政”工具优势。财政贴息、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均可推出。“准财政”政策主要由央行、政策性银行等主导实施，将财政与“准财政”工具结合，有助于优化政策的组合、协同性。去年金融工具、贴息贷款分别投放7399亿元和2000亿元，后续有常态化运营的可能。

田利辉表示，继续加大落实减税降费和重点民生事项等专项转移支付工作也是后续重点发力方向。同时，对于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教育医疗等具有外溢公益性的产业也应扩大财政补助。

从减税降费角度看，近期已有多项政策出台。比如，6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出“2023年底前，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6月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也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至此，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迎来第四次延期。

陈雳表示，总体来看，今年财政政策可从“质”和“量”两方面发力。一方面，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保持合理适度财政支出强度；另一方面，优化资金配置和结构，提高使用效益，并且更具可持续性。

国际ESG披露准则成为重要参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ESG指标体系愈发重要

■本报记者 谢若琳
见习记者 毛艺融

6月26日，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以下简称“ISSB”)正式发布《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简称“IFRS S1”)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简称“IFRS S2”)。据悉，ISSB的目标是制定一套全面的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全球基准”，用来满足全球投资者的需要。

随着ESG(公司、环境和治理)报告成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张“财报”，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率逐年增长。据中上协数据统计，逾1700家A股上市公司单独编制并发布2022年ESG相关报告，占比34%，A+H、央企控股、主板上市公司发布率先领先。

商道融绿董事长、中国责任投资论坛理事长郭沛源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提升ESG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是大势所趋，A股上市公司应该重视起来，提前学习ISSB准则的要求。特别是从ISSB准则的内容中，预见到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发展趋势，譬如披露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按照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的框架来披露。”

提升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质量

ISSB准则以漏报、错报或掩盖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是否影响用途的财务报告主要使用者决策作为重要性标准。从内容要求来看，ISSB准则采取“搭积木”的方法，允许主体在ISSB准则所要求的信息之外，披露其他信息(如特定司法管辖区要求披露的信息)，前提是这些额外的信息不会掩盖ISSB准则所要求披露的信息。

据悉，新发布的ISSB准则将于2024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年度报告期间内生效，并允许提前采用。安永报告认为，ISSB准则旨在提供透明度和可用性，也有利于促进数据的再利用和再开发，从而带动新业态的创新和发展。

王鹏进一步表示：“目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还处于起步与实践阶段，也逐渐成为数据服务机构关注的焦点。因为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资源，公共数据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在‘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下，参与公共数据共享共治的企业，将在数据收益和分配机制日益成熟下首先获益。”

多海外资本的青睐。

绿色未来信息科技创始人张仕元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此次发布的ISSB准则是在充分借鉴中国财政部修订意见的版本，未来有可能成为我国相关会计准则修订的参考基础。同时，ISSB准则将为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展规范的ESG信息披露提供可参照的行动指南。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ESG指标体系

在建立一套高质量的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基准性标准成为全球共识的背景下，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指标体系愈发重要。

去年5月份，国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指出，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今年4月份，港交所发布《优化环境、社会及管治框架下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咨询文件，迈出与ISSB准则接轨的第一步。

对于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ESG指标体系，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全职理事冷冰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相关准则可能会和ISSB这套准则产生联系，或者直接采用，或者在此基础上做一些变化。站在ISSB角度，鼓励先建立本国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建立机构，再把ISSB准则引入并施行起来。

郭沛源表示，在采纳相关国际标准的时候，不一定要“照单全收”，可以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求大同存小异，加强对标、逐步趋同，是建立适应全球化准则且有中国特色的ESG披露准则的必由之路。

随着资本市场将ESG因素纳入投融资考量中，将对以财务价值为考量的估值体系进一步修正和优化。特别是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背景下，ESG因素在识别实体内在价值、应对潜在风险以及披露ESG信息发挥着积极意义。Wind数据显示，截至6月27日，ESG主题基金已有255只，ESG主题指数已有412条。

“近两年，中国ESG投资的热度快速升温，虽然增速很快，但相关资产的规模在整体市场中的占比仍然较小，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张仕元表示，如果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更加规范，有助于投资者在同行业公司中筛选出“ESG优生”，剔除不符合其ESG投资策略的标的，实现满足投资策略的资产配置。

各地积极推动公共数据共享共治 专家表示数据治理、开发利用市场空间非常大

■本报记者 郭冀川

6月26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立足数字经济新赛道 推动数据要素产业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3—2025年)》并指出，要主动跟踪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推动数据要素产业高质量发展。其中提出要强“赋能”，大力推动公共数据共享共治。

早在2019年，上海就出台了《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成为国内首部针对公共数据开放的地方政府规章，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率先主动开放，让数据产生价值、助力高质量发展。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何宝宏表示，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其中提出要建立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为此前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中存在争议的

“所有权”问题提供了一种合理解决思路，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带来了全新机遇。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统计，北京、海南、贵州、成都等地积极开展各类创新实践探索，基本形成了公共数据的授权运营模式。公共数据管理机构进行资源整合，统一推进开发利用，授权运营机构或加工方进行数据处理加工，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进入市场，提供应用方。

“目前为止，公共数据尚未形成统一的授权运营机制，实践中存在风险和障碍，还需要探索更完善的标准规范体系，从运营主体能力、运营平台技术、运营成果等方面切入，促进规范化发展。”何宝宏说。

在“数据二十条”指导下，杭州、青岛、武汉等地相继发布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管理办法，推进建立工作机制。河南、福建、湖北等地相继成立地方数据集团公司作为开展授权运营的市场主

体，推动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开发利用。

上市公司也成为公共数据运营管理的重要力量。广电运通在6月20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介绍，公司积极培育数据要素一级市场业务的建设与运营能力，在公共数据处理加工、运营、交易等环节打造核心竞争力。

博思软件5月6日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与福州市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将在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运营等领域深入合作，并基于双方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共赢，抓住数字机遇，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为创新场景应用绘新蓝图。

东吴证券分析师王紫敬认为，截至2023年1月1日，我国共有2843个县级单位，数据资源将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资产，在数据不出域的前提下，为了满足各地不同的政务需求，预计各个县级单位都将有望开发自己的政务垂直模型，并伴随产生相对数据治理、开发

利用的需求，市场空间非常大。

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鹏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数据二十条”的出台，我国从中央到地方有关部门、企业和组织，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改革做出了大胆探索。政府或相关机构向公众提供公共数据，并授权运营商在符合一定条件和限制的情况下使用、共享和加工这些数据，将促进公共信息的共享和开放，提高公共信息的透明度和可用性，也有利于促进数据的再利用和再开发，从而带动新业态的创新和发展。

王鹏进一步表示：“目前公共数据授权运营还处于起步与实践阶段，也逐渐成为数据服务机构关注的焦点。因为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资源，公共数据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在‘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下，参与公共数据共享共治的企业，将在数据收益和分配机制日益成熟下首先获益。”